

迴異時流——從學術觀念與詮釋方法探討 陳寅恪的音韻學研究

王松木*

(收稿日期：111 年 7 月 5 日；接受刊登日期：111 年 10 月 13 日)

提要

陳寅恪雖以史學見長，但其人博學多識、旁搜遠紹，早年遊學海外，深受德國古典語文學之薰陶，在〈四聲三問〉、〈東晉南朝之吳語〉、〈從史實論切韻〉等文章中所展現的觀念與方法，對於漢語音韻學未來之開展，實有值得借鑑取法之處。本文擬以陳寅恪的音韻學研究為主要闡述對象，分析陳寅恪的學術淵源、治學方法及其影響與啟示，申論陳寅恪音韻學體現之人文特色，有異於高本漢的「語音史」模式，能夠開拓學術新範疇、補前修之未逮，足以示後人以軌則，堪為未來漢語音韻學轉型之範例。

關鍵詞：陳寅恪、語文學、音韻學、文化史、格義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一、緒論——非主流的音韻學家

陳寅恪（1890-1969）以史學成就享譽學界，其治學始終以「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作為圭臬，對於自身的治學理念與學術路徑，曾自剖曰：「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¹、「論學論治，迥異時流」²。正是基於此種自主創新之信念，故往往能有獨闢蹊徑、不落俗套之卓見。

陳寅恪治學範圍寬廣，除史學外，在音韻學上亦有深厚的造詣，無論舊派之乾嘉考據學，或新派之高本漢「語音史」模式，均有相當程度的認識。³雖然陳寅恪正式發表的音韻學專文不多，僅見〈四聲三問〉、〈東晉南朝之吳語〉、〈從史實論切韻〉三篇，但今日讀來，仍不失為立論新穎、擲地有聲之佳作。然而，十分弔詭的是，陳寅恪非但未曾以音韻學家自居，且似乎刻意與音韻學主流群體保持距離，⁴故在論及音韻問題時，每每於文章開頭便自謙曰：

寅恪於音韻之學，無所通解，故不敢妄說。……凡所討論，大抵皆屬於史實之範圍，至於音韻學之專門性質者，則少涉及。此非唯謹守「不知為不知」之古訓，亦藉以藏拙云爾。⁵

¹ 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1942）：「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年來自審所知，實限於禹域以內，故僅守老氏損之又損之義，捐棄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復敢上下議論於其間。」陳寅恪：《寒柳堂集》，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一）》（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144。

² 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余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蓋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所謂退化論之說者。是以論學論治，迥異時流，而迫於時勢，噤不得發。」陳寅恪：《寒柳堂集》，頁150。

³ 陳寅恪是較早接觸高本漢學說的中國學者之一，在〈致容庚〉（約1928年）信件中，陳寅恪向容庚（《燕京學報》主編）推薦朱芳圃翻譯日人評論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的文章，提及：「弟以為高本漢之音韻學風靡一世，評論其書之文尚不多見，似宜介紹於中國學術界。」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15年），頁8。

⁴ 當代漢語音韻學主流係以高本漢、趙元任為代表的「語音史」典範。陳寅恪的音韻學偏向「語文學」（philology）範疇，與高本漢、趙元任的「語言學」（linguistic）路徑有所差別。

⁵ 此段文字引自〈從史實論切韻〉，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一）》（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3月），頁342。在〈四聲三問〉、〈東晉南朝之吳語〉兩篇音韻學論文中，開篇首段亦有類似的話語，這儼然已成為陳寅恪討論音韻學問題時的固定套語。

音韻研究並非陳寅恪治學之重點，只能算是在史學本株上所萌生的一朵奇葩。正因如此，今人鮮少關注陳寅恪在音韻學上的創見與影響。⁶然而，所謂「旁觀者清」，陳寅恪立足於音韻學主流群體之外，以文化史觀點詮釋中古音韻學文獻，反倒更能看清文本中可疑的細節，從而提出顛覆舊說之創見。許世瑛（1910-1972）曾得陳寅恪親炙，⁷對其治學精妙之處有深刻的體會，在〈敬悼陳寅恪老師〉一文中，許世瑛講述陳寅恪音韻研究之特色，云：

寅恪師並非是一位語言學家，但他寫的〈四聲三問〉一篇論文，確是一篇千古不朽的論著，每次我講「四聲」的時候，一定向同學介紹寅恪師這篇大著。同時我還向同學們談談寅恪師的為人，告訴他們說：「你們的太老師陳寅恪先生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權威學者，他的治學方法和態度是科學的、公正的、鎮密的、嚴謹的。他的論述新而不怪，奇而不邪，只要讀過他的論述的人無不唯唯稱是，欣然接受他的論斷。

8

許世瑛對於陳寅恪的評論僅是課堂上隨口提及，未能深入闡釋，不免令人好奇，諸如：

- （一）陳寅恪既非語言學家，如何寫出「千古不朽」的音韻學論著？
- （二）陳寅恪的治學進路為何？對於音韻學之選題、立論，有何影響？
- （三）陳寅恪之音韻學研究模式，有何「新」、「奇」之處？如何理解與評價？對於後來學者有何啟發？

為了嘗試解開上述疑惑，本文擬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著眼，以陳寅恪「迴異時流」的音韻學為對象，一方面探究陳寅恪之語言觀與方法論；一方面評價陳寅恪音韻學之學術成果，從而觀察其如何立足於「文化」本位反思漢語的特質，以及如何從文化史角度呈顯中古士族對漢語音韻系統的認知。

⁶ 據個人所見，在少數與本文主題相關的研究中，當以平田昌司：〈讀陳寅恪《四聲三問》〉，《學人》第10輯（1996年9月），頁197-217，林燕：〈陳寅恪的語言思想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第17卷5期（2016年9月），頁55-62，二文最值得注意。

⁷ 許世瑛學術研究的選題方向深受陳寅恪影響，請參閱楊焄：〈許世瑛與陳寅恪：文章背後的學緣〉，收入《卻顧所來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頁138-146。

⁸ 許世瑛：《談陳寅恪·敬悼陳寅恪老師》（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年），頁47。

二、觀念與方法

陳寅恪的學術成果集中在三大領域—東方語文學、中古文化史、古典詩文考釋與評論。綜觀陳寅恪一生的學術歷程，其治學方向經歷過三次重大的轉向，余英時稱之為「史學三變」。⁹

自 1932 年之後，陳寅恪毅然「捐棄故技」，不在歐洲東方學擅長之領域與西人爭勝，轉而投入中古文化史之研究，開啟「考據實證」與「義理詮釋」並重之史學新路徑。陳寅恪的音韻學論文，正是中古文化史研究的副產品。觀察各篇音韻學論文之撰成時間，皆介於 1934 年至 1948 年之間，且均以「文化史」視域詮釋史籍文本中的音韻現象，陳寅恪〈四聲三問〉清楚表明：「凡所討論，大抵屬於中古文化史常識之範圍」。¹⁰

民國初年，主流音韻學家承繼著清代漢學家的路徑，並引入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將音韻學研究推向更科學化、形式化的境地，因而也就越來越遠離人文思想。陳寅恪兼通乾嘉考據學與德國語文學，但卻能自覺超越實證考證之狹隘格局，¹¹以「文化」為依歸，以建立「新宋學」為理想目標。¹²

相較於當時新舊兩派的學者，陳寅恪對西學的態度卻顯得冷靜而理性，即其所謂「轉思處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謂馮軾而觀士戲者」（朱延豐《突厥通史》序），既不同於「歐

⁹ 陳寅恪的治學旨趣不變，但研究課題則順應自身學養、社會環境、教學需求、個人健康等因素而有所調整。余英時根據陳寅恪史學思想之轉變，將其治學歷程切分成三個階段，依序為：1.「殊族之文，塞外之史」（1923-1932）；2.「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933-1949）；3.「心史」（1949-1969）。陳寅恪的音韻學論文為「第二變」階段之作品。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試論陳寅恪的史學三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19 年），頁 315-358。

¹⁰ 陳寅恪：〈四聲三問〉，《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328。

¹¹ 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剖析清代史學不振的原因，並批評清季經學家之欠缺系統、奇詭悠謬，有如圖畫鬼物一般，云：「獨清代之經學與史學，俱為考據之學，故治其學者，亦並號為樸學之徒。所差異者，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具體，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一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經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二）》（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頁 238。

¹²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1943）闡述個人對文化演變遷的看法，並以建立「新宋學」作為文化復興之標竿：「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盪及外緣薰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譬諸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又可庇蔭百十人矣。」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45。陳寅恪對於「宋學」之推崇，始終如一，晚年在〈贈蔣秉南序〉（1964）再度重申宋朝文化之可貴，云：「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陳寅恪：《寒柳堂集》，頁 162。

化派」之激進，也不同於「國粹派」之保守，而傾向於同情「學衡派」，其立場介於激進與保守之間。正因如此，陳寅恪能以較超然客觀的態度看待西方文化之輸入，不為社會集體迷思所蒙蔽，清醒地認識引入西方學理之利弊得失。¹³陳寅恪的治學始終以重振「文化」為標的，並以「文化」視域來詮釋歷史發展之態勢，此種以「文化」為本位所構築的學術體系，傅璇琮稱之為「文化史的批評」。¹⁴處在當時歐化風氣瀰漫的時局，陳寅恪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相對顯得過時保守、復古僵化，似乎有些不合時宜。然而，站在今日立場，以事後諸葛的眼光評議，或許陳寅恪文化觀才是真能預時代之新潮流，真能示來人以軌則。¹⁵

語言是「複雜的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語言既有生理、心理的基礎，同時也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是以語言既能呈顯世界普適之「共性」，但也反映著民族精神之「殊性」。就社會功能而言，語言不僅是人我互動的溝通媒介，也是區別異己的身份表徵。試想：陳寅恪從文化史角度審視語言，對於漢語結構有何獨特認知？在研究方法上有何特殊見解？這對漢語音韻學研究可能帶來何種啟發與影響？當前漢語音韻學隱然已浮現疲弊之態，上述問題特別值得我們探究與省思。

(一) 語言觀—語言之民族殊性

語言既有多元面向，究竟哪些語言現象值得觀察？哪些語言問題具有詮釋的價值呢？這當取決於研究者抱持著何種「語言觀」。以趙元任為代表的新派學者傾向於將語言視為交際工具，故多依循結構主義的形式語言學，注重描寫語言的發音特徵、聽覺感受；相較

¹³ 1935年，陳寅恪研讀《高僧傳》，論及佛典之翻譯與傳播，曾有感而發：「間接傳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環境之故，轉可發揮其特性而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歐洲，與希臘哲學接觸，而成中世紀之神學、哲學及文藝是也。其害，則展轉間接，致失原來精意，如吾國自日本、美國販運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其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研究本原首在通達其言語，中亞語言與天竺同源，雖方言小異而大致可解，如近世意語之於拉丁。」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1997年），頁86。

¹⁴ 傅璇琮指出：「作為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是有他的學術體系的，這個體系，不妨稱之為對歷史演進所作的文化史的批評。無論是他的中國中古史的研究、宗教史研究、語言學的研究，以及古典文學的研究，在根本觀點上，無不與他的這種文化史批評相聯繫。」傅璇琮：〈一種文化史的批評——兼談陳寅恪的古典文學研究〉，《中國文化》第1期（1989年2月），頁79。

¹⁵ 余英時〈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云：「『五四』以後，思想主流受實證論與社會進化論的影響極深，反中國文化傳統的潮流愈演愈烈，而陳寅恪卻逆流而行，正如吳宓所說，他繼續主張『中國文化本位論』並『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全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他當然可以當『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稱號而無愧。……在意識形態之爭基本上已告結束的今天，陳寅恪的文化觀反而和新一代的世界文化思潮越來越接近。這真是歷史的諷刺。」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296-297。

而言，陳寅恪則將語言視為民族文化之表徵，較為貼近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一脈的德國古典語文學，¹⁶故多聚焦於理解語言的社會文化功能，與當代功能主義之語用學（pragmatics）、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較為相近。

洪堡特的「語言世界觀」（Weltansicht）¹⁷與傳統的「語言工具觀」相比，主要差異為何？林遠澤試著將二者加以對比，¹⁸茲將其整理歸納的結果徵引如下：

	亞里斯多德-萊布尼茲觀點	洪堡特觀點
對語言本質的看法	語言是約定俗成的記號系統	語言是建構思想的器官
	語言是傳達思想的媒介或工具	語言是思想的可能性條件
	語言的差異只是聲音的差異	語言的差異是世界觀的差異
對普遍語言學任務的界定	普遍的語言學應研究思想之抽象形式的邏輯——語法學	應建立一門「普遍的歷史語言學」研究語言有機體的運作程序
	語言的比較研究預設有一原始語言（Ursprache）	語言的比較研究僅預設在語言溝通中的普遍可理解性
	由此可探討民族遷移分化的「自然史現象」	由此可以展現人類精神發展之各個側面表現的「智性—目的論現象」

儘管陳寅恪未曾確切表明，但觀察其史學思想與考據方法，並考量其留學柏林大學的經歷，或可推斷陳寅恪多少受到洪堡特語言哲學觀的影響，故多從文化史的視域詮釋語文

¹⁶ 威廉·洪堡特是德國知名的語言學家、教育家與政治家。洪堡特於 1810 年創建柏林大學，提出以「寂寞」與「自由」作為大學的基本組織原則，強調科學研究有其超越實用的崇高價值，且不應受到意識形態與功利效益之羈絆，此種獨立自主的治學精神，即陳寅恪所言：「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關於洪堡特其人其學之詳細介紹，請參見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語言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5 年），頁 1-235。

¹⁷ 十九世紀初，德國洪堡特提出「語言世界觀」概念，認為各民族不同的語言結構形式，即是不同世界觀的表徵，在〈論與語言發展的不同時期有關的比較語言研究〉中，指出：「語言的差異並非只是聲音與記號的差異，而是世界觀（Weltansicht）自身的差異。所有語言研究的基礎與最終目的都包含在這裡面。」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譯注：《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29。

¹⁸ 林遠澤：《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 年），頁 217。

問題，¹⁹體現德國古典語文學的人文主義傳統，²⁰而與趙元任等人所推崇的高本漢「語音史」研究模式——以擬構古代漢語音系、歸納音變規律為要務，²¹截然有別。

二十世紀初期，主流漢語研究者依循「語言工具觀」之慣性思維，認同語言研究是一門「科學」，研究者必須選擇能反映口語的真實材料，對於那些摻雜個人主觀意念的文本，流於虛妄迷亂、穿鑿附會，無法據以有效重構古代語言，故多直接予以汰除。²²相對而言，陳寅恪傾向從古典語文學的人文視角觀看，認為「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今人看似謬妄無理之說法，若能將文本置回古代的情境中，與古人站在同一立場思考，釐清古人著述之意圖與目的，這類看似主觀迷亂、思維混沌的文本，其研究價值將產生「格式塔翻轉」（gestalt shift），從不科學、不客觀、不精確的「假材料」，頓時蛻變成足以窺探古人心智與理想之「真材料」。在〈大乘義章書後〉（1930）中，指出：

嘗謂世間往往有一類學說，以歷史語言學論，固為謬妄，而以哲學思想論，未始非進步者。如《易》非卜筮象數之書，王輔嗣、程伊川之注傳，雖與《易》之本義不符，然為一種哲學思想之書，或竟勝於正確之訓詁。……，要在從何方面觀察評論之耳。²³

陳寅恪迴異時流的語言觀，雖能廓清主流學說之思維盲點，洞察到常人眼中的「假材料」在思想史研究上所潛藏的「真價值」，但宣揚此種違逆主流思潮的異見，卻也容易讓自身陷入曲高和寡、難有知音的窘境。1932年爆發的「對對子」風波，²⁴即是讓陳寅恪飽受非議的具體事證。

¹⁹ 林燕也留意到：「Humboldt 的觀點與陳寅恪有關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關係的認識是一致的。民族是以一個確定的方式構成語言的人類群體，人類所具有的本性的發展取決於語言的發展，民族語言與民族精神之間是緊密聯繫、不可分割的。」林燕：〈陳寅恪的語言思想研究〉，頁 58。

²⁰ 童慶生指出：「德國語文學的傳統根植於德國學術中特有的歷史人文關懷，在這一偉大的傳統中，赫爾德和稍後的施勒格爾兄弟（A.W. Schlegel 和 F. Schlegel）都認為歷史的發展體現在個體的民族精神（Volkgeist）之中，並將此定義為語文學研究中最重要主題。」童慶生：《漢語的意義——語文學、世界文學和西方漢語觀》（北京：三聯書店，2019 年），頁 63。

²¹ 瑞典·高本漢著，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13。

²² 羅常培持現代科學理性客觀之標準，批評韻學舊籍之玄虛附會，曰：「舊籍韻書之屬判為『古韻』、『今韻』、『等韻』三科。而較其短長，或是古非今，罔識通變；或專己守殘，拘墟自封；或妄立『門法』，徒滋迷離，均不足語於科學也。」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臺北：里仁書局，1982 年），頁 5。

²³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165。

²⁴ 關於「對對子」試題之爭議及其輿論報導，請參閱蕭伊緋：〈陳寅恪「對對子」試題爭議始末——以北平《世界日報》相關報導為中心〉，《關東學刊》2017 年第 5 期（2017 年 5 月），頁 116-141。

1932年夏，陳寅恪接受清華中文系代理主任劉文典（1890-1958）之請託，擔任清華入學考試之國文命題。陳寅恪認為：國文試題必須考驗學子是否通曉文理，其關鍵在於檢測其能否認識華夏語言文學之特質。若依此目標，應該如何命題呢？陳寅恪認為在中國文法尚未成立之前，可暫用「對對子」的方法，測驗考生能否辨別虛實字、分別平仄聲，並考察其語藏之貧富、思想之條理。雖說陳寅恪以「對對子」命題有其學理基礎，但卻與普羅大眾的認知脫節，甚至也無法獲得新派學者的響應支持，引發社會輿論持續批判的聲浪，²⁵使陳寅恪成為眾矢之的，孤立無援，被迫不得不親上火線做出回應，闡述命題的理念及其學理基礎。

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陳寅恪陳述以「對對子」命題之用意，強調文法研究應當凸顯出語言之民族殊性，否定憑少數語言所歸納出之規律作為普世通用之準則，指出：

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於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相，歸納為若干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統系學說，定為此種語言之規律，並非根據某一種特種語言之規律，即能推之以概括萬族，放諸四海而準者也。假使能之，亦已變為普通語言學音韻學，名學，或文法哲學等等，而不復成為某特種語言之文法矣。²⁶

陳寅恪側重語文之「民族特性」，此一觀點與洪堡特的「語言世界觀」相契合，卻與當時主流的「語言工具觀」脫節，兩者之間所存在的觀念落差，必得接受過德國語文學洗禮的學者方能有深切體察，若非同道之人很難領會其中要旨。陳寅恪揣想，盱衡當時周遭親近之友人，大概唯有傅斯年一人深入學習過德國古典語文學，能夠理解其不合常規之舉措所隱含的深層意圖，在〈致傅斯年書〉中，陳寅恪私下回覆傅斯年詢問，再次申明以「對對子」命題之用意，並以較諸〈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更為露骨、激切的言詞，重拳反擊當時學界眼光之偏狹與落後，甚至憤恨表明若來年仍是由他命題，將只出「對對子」這種題型。陳寅恪在寫給劉文典、傅斯年的書信中，如何批判當日主流的語文觀點？茲將陳寅恪的說法，徵引如下：

²⁵ 社會輿論爭鳴集中發表在1932年8月7日～19日《世界日報》的「讀者論壇」中，以反對意見居多，主要的責難意見可概括為三點：1.「對對子」是復古倒退的測驗方式；2.「對對子」的考試內容與中學國文教學的目標脫節；3.對子之優劣良窳不易客觀評定。

²⁶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21-222。

今日言之，徒遭流俗之譏笑。彼等既昧於世界學術之現狀，復不識漢族語文之特性，挾其十九世紀下半世紀「格義」之學，以相非難，正可譬諸白髮盈顛之上陽宮女，自矜其天寶末年之時世裝束，而不知天地間別有元和新樣者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²⁷

在給傅斯年的信件中，我們得知陳寅恪以「對對子」命題其實別有「深意」，隱藏著改革中學語文教育的理想目標。信中提及：

中國對子與中國語之特點最有關，蓋所謂文法者，即就其語言之特點歸納一通則之謂，今印歐系「格義」式《馬氏文通》之文法，既不能用，捨與中國語特點最有關之對子，而更用何最簡之法以測驗學生國文文法乎？以公當知此意，其餘之人，皆弟所不屑與之言比較語言文法學者，故亦暫不談也。……總之，今日之議論我者，皆痴人說夢，不學無術之徒，未曾夢見世界上有藏緬系比較文法學，及印歐系文法不能適用中國語言者，因彼等不知有此種語言統系存在，及西洋文法亦有遺傳習慣不合於論理，非中國文法所應取法者也。弟意本欲藉此以說明此意於中國學界，使人略明中國語言地位。將《馬氏文通》之謬說一掃，而改良中學之課程。（〈致傅斯年〉）²⁸

陳寅恪之苦心孤詣，當時學界或許只有傅斯年能得其三昧，但傅斯年並卻未與陳寅恪站在同一陣線，不見其挺身而出、發言響應。以旁觀者立場思考此樁事件，當日傅斯年的沉默並不令人意外，因傅氏身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健將，向來積極力倡白話文，對於「對對子」這種科舉制度下傳統文人的語文訓練，正是新文化運動者所要批判、揚棄的對象，豈會背棄己身本有立場而發聲相挺？再者，如前文所述，傅斯年雖與陳寅恪於柏林大學一同研讀古典語文學，但其學術思想卻明顯偏向於科學主義，與陳寅恪所持之「文化本位論」並不相侔。經此事件後，或許陳寅恪也察覺到與傅斯年之間的隔閡，此後雖與仍與傅斯年保持緊密聯繫，但卻也僅止於公務往來與私人情誼，在學術研究上二人已劃清界線，難以再有交集了。

「對對子」風波，歷時數週仍餘波蕩漾，想必對陳寅恪內心產生巨大衝擊，畢竟單憑一己之力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不僅未能達到改良中學課程的理想，甚至連「對對子」

²⁷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27。

²⁸ 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頁42。

也不曾再現於清華入學試題中；三十餘年後（1965 年），陳寅恪心中仍然惦念此事，在將〈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時，又特別寫下五百餘字「附記」加以補述。

如上文所言，1932 年是陳寅恪學術第一次轉向的分水嶺，為何陳寅恪突然捐棄「歐洲東方學」之故技？可能的因素甚多，但個人以為，「對對子」風波應是原因之一。因經歷此事件後，陳寅恪頓時感覺在歐洲東方學研究道路上，已是曲高和寡、孑然孤立，欠缺可以切磋論學之同道，既然海內不再存知己，倒不如捐棄故技，轉向「不古不今之學」，全心投入中古文化史之研究。

（二）實證考據——合本、格義之辨

陳寅恪的治學方法，融合考據實證與義理詮釋，既有來自中國傳統之根柢，又能與西方學術相融通。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指出：「如果用我們今天熟悉的觀念來說明他的治學方法，我們可以說他是『實證』和『詮釋』參伍以求，交互為用的。」²⁹首先藉由「實證」的考據工夫，考訂謬誤、梳理文本，通讀文本的表層意義，達到「由字通詞」的目的；其次，透過「詮釋」以闡發文本深層義理，達到「由詞而通道」的境界。

語文學者如何進行實證考據呢？通常運用「綜合分析、相互比較」之方法。然而，問題在於：該如何選擇合適的比較對象呢？又該依照哪些步驟有序地進行對比呢？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陳寅恪闡述比較考證法的根本要訣：

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相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而所與**互相比較**者，又必須屬於同系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蓋不如此，則不獨不能確定，且常錯認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語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繹遞變隔離分化之關係，乃各自成為大同而小異之言語。故分析之，綜合之，於縱貫之方面，剖別其源流，於橫通之方面，比較其差異。由是言之，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而具有歷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統也。³⁰

²⁹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49。

³⁰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23。

歷史語言學家運用「比較法」，嘗試構擬出已經死亡的原始祖語。此種歷史比較法乃是基於物種演化的原理，試圖透過同源語言（或方言）之橫向對比，觀察同源語言之間的形態差異，劃分出不同的演化階段，並參照語音演變之常態規律，排定其歷時演變的邏輯次序，從而還原共同祖語的可能面貌。因此，運用歷史比較法推求語言之原始狀態，必須以辨識是否「同源」為先決條件，此即陳寅恪所言「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

然則，並非所有語文學者進行比較時均有正確的歷史觀念。當時中國的語法學者多取歐洲語言來對比漢語，錯誤地將這兩種不同歷史來源的語料混同齊觀，如此只能得出「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在陳寅恪眼中，《馬氏文通》欠缺正確的歷史觀念，將印歐語言語法框架強硬地套用在漢語結構上，其所歸納出的漢語語法，必然是異種混血所生之「混沌怪物」，對此「馬氏謬種」必當除之而後快，以免抹滅了漢語之民族特性。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陳寅恪以「格義」一詞指稱此種牽強附會的詮釋謬誤，並追溯「格義」的歷史來源，云：

西晉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內典外書以相擬配，名曰「格義」，實為赤縣神州附會中西學說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國文學系之中外文學比較一類之課程言，亦祇能就白居易等在中國及日本之文學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國文學上之影響及演變等問題，互相比較研究，方符合比較研究之真諦。蓋此種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概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

31

追本溯源，「格義」式的漢語語法書源自於明末歐洲傳教士對漢語描寫與研究。歐洲傳教士為快速通曉漢語，遂以拉丁文語法作為分析漢語結構之框架，編定學習漢語的教科書，例如：西班牙傳教士瓦羅《華語官話語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1703）、法國傳教士馬若瑟《漢語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 1728）等。這類西方傳教士編撰的漢語語法書，原本只是迎合西方學習漢語便利之需求，難免以西方眼光看待漢語，是否真切體現漢語的民族特色，並非其首要考量的問題。³²降至清末，中國學者為追上西方強國的腳步，模仿西方傳教士或漢學家的手法編撰漢語文法書，在有意或無意之中，直接將西

³¹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23-224。

³² 關於近代西洋人之漢語文法論著，詳見李葆嘉：〈西洋漢語文法學三百年鳥瞰〉，《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 3 期（2020 年 5 月），頁 1-24。

方世界的漢語觀套用在自身民族語言上，形成所謂的「漢學主義」³³或「自我東方主義」³⁴，無形中反倒阻礙了我們對漢語自身特色的認知。

陳寅恪反對格義式比較法及其所潛藏的謬誤與偏見，強調從事任何歷史考證之比較研究，均應懷有「系統異同」之概念，不獨「語言學」如此，「比較文學」亦同。既然「格義」方法實不足取，如何才算是正確可信的史學考證方法呢？陳寅恪〈支愍度學說考〉提出「合本」比較法：

夫「格義」之比較，乃以內典與外書相配擬。「合本」之比較，乃以同本異譯之經典相參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結果迥異。故一則成為傳會中西之學說，如「心無義」即其一例，後世所有融通儒釋之理論，皆其支流演變之餘也。一則與今日語言學者之比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員珂之《楞伽經會譯》者，可謂獨得「合本」之遺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觀之作也。³⁵

陳寅恪區別「格義」與「合本」之異同，兩者同為六朝僧徒研究經典之法，其操作方式均是藉由文句之相互參校以考證意義，但實質上卻有所不同，不得不細加辨別。「合本」比較法乃是取同本異譯之文本相互參校，但除書面文本之外，比較法還可以擴展至出土文物、外族文獻等材料上。³⁶

陳寅恪對於《馬氏文通》深表不滿、猛力批判，視之為「格義」謬說之代表；相較之下，對楊樹達、沈兼士二人之訓詁學研究，則給予正面肯定、高度讚揚。在〈楊樹達《論語疏證》序〉云：

³³ 「漢學主義」(sinologism)是仿效薩義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所創造的新概念。對於「漢學主義」的內涵，顧明棟解釋道：「漢學主義是一種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認識論、方法論和西方視角的指導下所進行的有關中國的知識的生產，並因中國人和非西方人的參與而異常錯綜複雜。其中不僅有西方人通過西方視角對中國文明的觀察，更有中國人通過西方認識論和方法論對世界、對自己的文化，以及對自身的觀察。」顧明棟：《漢學主義——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20。

³⁴ 「東方主義」是指以西方視角看待東方文化；所謂「自我東方主義」，則是中國學者挪用西方視角審視自身的文化。童慶生陳述「自我東方主義」的弊病，指出：「作為（前）東方主義的產物，西方漢語觀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認識充滿謬誤和偏見，然而當它傳播到中國後，便開始強烈衝擊著中國語文的自我認識和中國文化的自我理解，帶來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後果。」童慶生：《漢語的意義——語文學、世界文學和西方漢語觀》，頁213-214。

³⁵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165。

³⁶ 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闡釋王國維的考據方法，歸納出三種比較方式：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陳寅恪與王國維的治學理念最為契合，〈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所揭露的三種比較法，也都體現在陳寅恪的文史研究中。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19。

先生治經之法，殆與宋賢治史之法冥會，而天竺詁經之法，形似而實不同也。夫聖人之言，必有為而發，若不取事實以證之，則成無的之矢矣。聖言簡奧，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語以參之，則為不解之謎矣。既廣搜群籍，以參證聖言，其言之矛盾疑滯者，若不考訂解釋，折衷一是，則聖人之言行，終不可明矣。今先生匯集古籍中事實與語言之與《論語》有關者，並問下己意，考訂是非、解釋疑滯。此司馬君實、李仁甫長編考異之法，乃自來詁釋《論語》者所未有，誠可為治經者闢一新途徑，樹一新楷模也。³⁷

楊樹達《論語疏證》之訓詁方法，廣泛蒐集與《論語》之相關材料，考訂是非、解釋滯疑，推求文本之真切意涵，此法與宋代司馬光、李燾的「長編考異法」近似，兩者均源自於佛典中之「合本」比較法。³⁸陳寅恪推舉以此方式註解，認為此法堪為訓詁學之新途徑、新楷模。

此外，在 1934 年〈致沈兼士書〉中，陳寅恪同樣也對沈氏〈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一文大為讚賞，云：

大作宗旨及方法皆極精確，實獲我心。大約中國語言文字之學以後只有此一條路可走。「右文」之學即西洋語根之學，但中國因有文字特異之點，較西洋尤複雜，西洋人蒼雅之學不能通，故其將來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滿意之結果可期；此事終不能不由中國人自辦，則無疑也。然語根之學實一比較語言之學。讀大作所列举諸方法外，必須再詳考與中國語同系諸語言，如西藏、緬甸語之類，則其推測之途徑及證據，更為完備。此事今日殊不易辦，但如德人西門，據高本漢字典，以考西藏語，便略有發明。西門中國學至淺，而所以能有少少成績者，其人素治印歐比較語言學，故於推測語根分化之問題，較有經驗故耳。總之，公之宗旨、方法，實足樹立將來治中國語言文字學之新基礎，若能再取同系之語言以為參證之資料，則庶幾可臻於完備之境域也。（〈致沈兼士〉）³⁹

³⁷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32。

³⁸ 陳寅恪〈陳述遼史補注序〉：「趙宋史家著述，如《續資治通鑑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遺意。誠乙部之傑作，豈庸妄子之書，矜詡筆削，自比於夏五郭公斷爛朝報者所可企及乎？」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34。

³⁹ 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頁 171-172。

沈兼士推闡宋代「右文說」，以《廣韻聲系》作為張本，利用漢字諧聲系統將字義相關之聲符（字根）繫聯成「字族」，觀察不同字族之間的語義關連，進而應用「右文」以探尋「語根」，藉此「橫向繫聯」、「縱向推源」的考證工夫，探求古今文字孳乳變易之歷時軌跡。沈兼士的研究法與西方語根之學相近，但就語源學（etymology）立場觀之，人類口語交際遠遠早於視覺化的文字，故今人推求語根不能只憑文字記號，應該結合親屬語言、漢語方言等口語材料。陳寅恪既高度肯定沈兼士的研究路徑及其成果，但也展現他個人對於歷史語言學的素養，提議除了運用「右文」材料外，更應參考德國漢學家西門華德（Walter Simon）之作法，廣泛對比藏語、緬語等親屬語言材料，如此推求語源之證據方能更為完備。陳寅恪對楊樹達、沈兼士二人大力褒揚，但卻不見對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有任何評論，兩相對照，其冷熱之情、抑揚之意，亦可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馬氏文通》一書的評價，陳寅恪雖給予負面評論，並斥之為「馬氏謬種」，但胡適、趙元任的態度卻迥然不同。胡、趙二人早年均曾以《馬氏文通》作為通曉漢語文法之啟蒙讀本，⁴⁰且當時主流語法學家亦多對《馬氏文通》抱持著寬容、肯定的態度，⁴¹如此更凸顯出陳寅恪觀點之「迥異時流」，其理想未免懸諸過高，故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持平而論，格義式比較法是異質文明接觸初期的必然產物。不同民族之文化有其共性，亦有其殊性，交流之初為求溝通便利，通常採取「求同去異」的權宜策略，暫且擱置自身之特點，透過格義式比較，整合出非驢非馬的混合框架；然而，格義式比較也潛藏著危險，尤其是居於弱勢的一方，往往屈從、依附在強勢文明之下，斷喪自身文化的認同感與自信心，久而久之，便容易忘卻自身本有之民族特色，而陷入「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的窘境。易言之，格義式比較雖然有利於眼下之「會通」，卻有礙於日後之「超勝」，可謂「短多長空」，治學者不可不辨。

⁴⁰ 胡適於1960年回憶道：「……活的語言是有文法的。像我的〈爾汝篇〉、〈吾我篇〉，各字都有一定的用法。所謂文法，是後人從活的語言之中分析出來的東西。我是從《馬氏文通》讀通文法的。」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補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頁232；趙元任回憶起1907年時的讀書經歷，說道：「我買了一本《馬氏文通》，乃馬建忠所撰之中文文法書，完全比照西方語文的文法，讀起來極感興趣。」趙元任：《從家鄉到美國——趙元任早年回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頁95。

⁴¹ 王震邦考察近數十年來中國語法學的發展，分析王力、周法高、呂叔湘、王海茶等學者對於《馬氏文通》的評價與態度，發現中國語法學實際發展與陳寅恪的預期背道而馳，指出：「於今視之，陳寅恪理想中的文法比較研究並未出現，格義式文法歷經後人修補，卻走出了另一條『大道』。」王震邦：《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46。

（三）義理詮釋——了解之同情

陳寅恪之學術成就真能「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者，關鍵不在精通實證考據之學，而在於側重義理之詮釋。「語文學」的任務不只是校訂文本、疏通字義，更得精準地闡釋文本的真切含意，是以「語文學」與「詮釋學」（hermeneutics，或譯為「解釋學」、「闡釋學」）本為一體、密不可分。⁴²

陳寅恪以建立「新宋學」為理想目標，又接受過「古典語文學」的洗禮，對於「詮釋學」之重要有深切的體認。根據清華學生卞伯耕的課堂回憶，陳寅恪當年（1932年）在講授「晉至唐文化史」課程時，曾論及舊、新兩派治學之缺失，指出：

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舊派失之滯。舊派作『中國文化史』，其材料採自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傳及諸志，以及《文獻通考》、《玉海》等類書。……這類文化史不過抄抄而已，其缺點是只有死材料而沒有解釋。讀後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與社會制度的關係。新派失之誣。新派是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很有條理，然甚危險。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歷史、政治、社會的材料，歸納而得的結論。結論如果正確，對於我們的材料，也有適用之處。……不過也有時不適用，因為中國的材料有時在其範圍之外。所以講大概似乎對，講到精細處則不夠準確。而講歷史重在準確，不嫌瑣細。⁴³

從上述引文可知，陳寅恪評判各派學者治學之優劣，不在於能否「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而在於能否對於史料做出有條理、夠準確的「解釋」。因此，如何建構精準詮釋史料的方法論？這問題自然成為陳寅恪史學思想的重點。⁴⁴

⁴² 沈衛榮指出：「與這種“文本語文學”相伴隨的還有一種被稱為高等批評（higher criticism）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注重考證文本的來源、成書時間和作者的身份等，旨在將一個文本置於還原了的語言和歷史語境中來考察。由於“語文學”和作為一種學術方法的詮釋學（hermeneutics）之間並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界線，二者最重視的都是如何正確地理解文本及這個文本所要表達的思想。」沈衛榮：《回歸語文學》（上海：上海古籍，2019年），頁9。

⁴³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陳寅恪先生傳》，頁221-222

⁴⁴ 據陳弱水觀察，陳寅恪史學方法論包含三項要素——嚴格的實證、想像力與感受力的發揮、歷史解釋（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觀念，指出：「對歷史研究的解釋層面之高度自覺與重視，不但是陳氏史學思想的重要成分，也可能是他對代中國史學最有貢獻的所在。」陳弱水：〈現代中國史學史上的陳寅恪——歷史解釋及相關問題〉，《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00年），頁39。

陳寅恪強調「了解之同情」對於歷史詮釋之重要性，⁴⁵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1930）中提及：

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⁴⁶

傅斯年在〈歷史語言所工作之旨趣〉中高喊「史學只是史料學」的口號，⁴⁷將乾嘉考據學與實證主義史學相結合，認為透過史料記載可客觀還原事件真相，不必刻意深入挖掘事件背後可能隱藏的道理；而研究歷史者，應當抱持不偏不倚的超然態度，以科學方法考證史料，避免摻入個人主觀的價值判斷。此種去人文化、去脈絡化的研究趨向，近似於結構主義語言學只關注語言「形式」的客觀描寫，而將複雜多變的「意義」暫且擱置不談。相較之下，陳寅恪認為歷史事件並非全是偶然巧合、混亂無序的，其中有其必然的因果關係，史學研究應當探查人事興替之隱微道理。

在〈俞曲園先生病中囑語跋〉（1928）中，陳寅恪將歷史演進的規律類比於幾何原理，指出：

天下之至蹟者莫過於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後三際（借用摩尼教語），猶物狀有線面體諸形。其演進先後之間，即不為確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關係。故以觀空者以觀時，天下人事之變，遂**無一不為當然而非偶然**。既為當然，則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寒柳堂集》）⁴⁸

歷史記載既是經過人為主觀去取，加上史料流傳過程必然有所散佚，如何才能從殘缺史料中還原真實的歷史事件？又如何能夠掌握歷史演進之規律，從而求得「通識」、「真

⁴⁵ 「了解之同情」來源為何？陳懷宇推測：此語出自於德語 *Einfühlung* 一詞，用以表示「移情」或「神入」之意。陳寅恪之所以使用此一話語，其思想源頭實可追溯至赫爾德。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25。

⁴⁶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47。

⁴⁷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頁3-10。

⁴⁸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一）》，頁146。

了解」之理想目標呢？對於上述疑問，陳寅恪主張必須摻入「想像」（神遊冥想），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則，訴諸個人之想像，難道不會有陷入主觀臆測、穿鑿附會的危險嗎？為防範主觀偏見之流弊，陳寅恪特別強調考證史實、詮釋思想，必得同時兼顧「古典」與「今典」，⁴⁹盡可能重演過往的歷史語境，設身處地與古人站在同一立場思考，方能突破一時間一地域之侷限，以縱貫眼光通觀全局，達到「真了解」之理想境地。否則，以自己主觀認知強加於古人，往往言論越有條理，則個人偏見涉入越深，越遠離歷史真相。

因欠缺「了解之同情」而引發詮釋之偏誤，不僅出現在哲學史研究上，在漢語音韻學上更是明顯。當代語音史研究者在解讀古代韻學文本時，每每在尚未確切掌握文本性質、作者意圖與受眾對象之前，便急著根據個人主觀認知判定音系性質、建構音系、擬測音值，往往所擬構的音系越嚴整、音值越精細，卻反倒離真實語音系統越遠。陳寅恪在漢語音韻學上的貢獻，得益於合理運用詮釋學方法，糾正前人詮釋音韻文本之誤差，並以「人」為本位，從文化史視角提出新穎的問題，為建立人文主義音韻學研究而獨闢蹊徑、導夫先路。

三、成果與評價

嚴格說來，陳寅恪只能算是業餘的音韻學研究者。然而，正因其自覺站在主流學術群體之外，相對保持客觀與冷靜，不受集體意識形態之羈絆，而更能看清主流模式的闕漏與謬誤。根據上文論述，我們對於陳寅恪的為學目標、理論基礎、治學方法等已稍有理解，在此認知基礎之上，則可進一步深入評述音韻學之研究成果及其學術意義。

（一）論「發明」四聲（據〈四聲三問〉）

追溯「平上去入」四聲名目之源起，實始於南齊永明年間，為審音文士沈約、周顒等

⁴⁹ 陳寅恪〈讀哀江南賦〉解釋「今典」及其考證之難，指出：「於古典甚易，於『今典』則難。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事也。故須考知此事發生必在作文之前，始可引之，以為解釋。否則，雖似相合，而實不可能，此一難也。此事發生雖在作文以前，又須推得作者有聞見之可能。否則其時即已有此事，而作者無從取之以其文。此二難也。」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頁209。

人所創立。⁵⁰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漢語聲調在上古時期應該就已經存在了，四聲名目為何遲到南齊時期才被沈約等人所確認呢？為何聲調數目適為「四」（而非五聲、七聲）？又為何時間（不早不晚）恰好落在南齊永明年間呢？為何是沈約等人（而非其他人）所發現呢？南朝史書論及聲調者，大多仍以傳統樂律之「宮商角徵羽」來區分聲調之差別，未曾提及「平上去入」四聲之目，究竟傳統五聲與永明四聲之同異關係為何？上述疑問，是主流音韻學家鮮少細想、普遍漠視的問題，卻是陳寅恪從文化史角度覷見，並想要試圖破解的謎團。

個人以為，欲討論「平上去入」的分類理據，必得先澄清幾個容易被混淆或誤解的觀念：第一，「平上去入」為追求文學「聲律」而設，不同於語言學之「音位」用於辨別意義；換言之，「平上去入」的語用功能與「平仄」相似，專用於文士階層之詩文創作，藉由四聲之巧妙搭配，以求「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南史·陸厥傳》），⁵¹營造出音聲迭代、韻律和諧的美感效果；第二，「平上去入」是審音文士主觀的、理想化的分類，體現永明詩人對聲調範疇化（categorification）之獨特認知，而不同於今日語言學田野調查之客觀描寫，故與其說沈約等人「發現」四聲，不如說他們「發明」四聲。

其實，關於平上去入四聲之性質與功用，段玉裁、王國維已有清楚的認知，故二人主張「四聲之說，專主屬文」，⁵²陳寅恪即是受段、王二人的啟發，加上自身從文化史角度的觀察與思索，遂撰成〈四聲三問〉一文，以問答體的文本形式，嘗試破解上述的疑難問題，並提出以下幾項假說：

1. 「平上去」三聲，乃依據及模擬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而來，再加上漢語本易分別的「入」聲，適為「四聲」之數。

⁵⁰ 日僧空海《文鏡秘府論·天卷·四聲論》引隋代劉善經《四聲指歸》：「宋末以來，始有四聲之目，沈氏乃著其譜論，云起自周顒」。日·空海：《文鏡秘府論》（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年），頁25-26。

⁵¹ 陳澧《切韻考》也指出沈約之「四聲」乃詩文聲律，云：「沈約《四聲譜》乃論詩文平仄之法，非韻書也。若韻書則李登、呂靜早有之，不得云『千載未悟』。況韻書豈能使五字音韻悉異，兩句角徵不同，十字顛倒相配乎？」清·陳澧撰，羅偉豪點校：《切韻考》（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卷6，頁159-160。

⁵² 段玉裁〈古四聲說〉子注云：「或謂四聲起於永明，其說非也。永明文章，沈約、謝朓、王融輩始用四聲以為新變，五字之中音韻悉異，一句之內角徵不同。梁武帝不好焉，而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謂如以此四字成句，是即行文四聲諧協之旨，非多文如梁武帝不知平上去入為何物，而捨以此四字代平上去入也。」清·段玉裁：《六書音均表》，收入《說文解字注》（臺北：天工書局，1987年），頁815-816。王國維〈五聲說〉曰：「（沈）約知有五聲而作《四聲譜》者，以四聲為屬文而作，本非韻書，……。四聲者，就今音言之也，且五聲專以聲言，四聲乃以聲音之運用於詩文言。」王國維：〈五聲說〉，《定本觀堂集林》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91年），卷8，頁344。

2. 南齊永明年間，審音文士與善聲沙門齊聚共居於建康，二者合作共同創造出四聲。
3. 「宮商角徵羽」為傳統本有之理論，「平上去入」為西域輸入之技術；五聲用於「論理」，四聲則用於「屬文」，兩者為體用之關係，各自承擔著不同的語用功能。

相較於主流音韻學家，陳寅恪的詮釋凸顯出幾項「迴異時流」的觀點：

A. 以文化為依歸

主流音韻學家基於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立場，或關注聲調的物理屬性，或側重調值之形式描寫，如：劉復《四聲實驗錄》(1924)以聲學儀器測量聲調的音高變化、趙元任“A System of Tone Letters”(1930)創立標示調值的「五度制標調法」。相較之下，陳寅恪則從文化史角度著眼，關注中國與天竺的文化交流過程，從語言外部探索四聲之分類理據與歷史來源，主張：四聲之別乃肇因於「借轉讀佛經之聲調，應用於中國之美化文」(1934: 329)，可說是永明時期審音文士與善聲沙門交流互動之結晶，遂以《高僧傳》所載作為主要憑據，又與其他史籍之文相互釋證，試著闡釋四聲說成立之社會環境與時代背景。

B. 以「人」為本位

主流音韻學家以「音」為本位，關注語音的形式描寫與歷史重構，進而探索語音演變的普遍規律，假設說話者為「理想人」，將其主觀因素排除在外，且不考慮與文化傳承、環境互動。相較之下，陳寅恪治史十分強調個人家世、民族文化，一則根據《高僧傳》檢索諸多善聲沙門之身世背景，知曉這些西域胡人從何而來、聚居何處、何時最盛……等，推斷「建康經唄之盛，實始自宋之中世，而極於齊之初年」；一則以「南齊竟陵王蕭子良造經唄新聲」之史事為軸心，考察沈約、周顒等永明新體詞人之家世與興趣，並推論永明文人精於審音可能是受到當日善聲沙門之薰習。

C. 明辨體用之別

學者關注聲調問題，主要可分為「本體」與「功能」二種路徑。前者關心「聲調是什麼」屬語音學範疇，後者則留意「以聲調來做什麼」屬語用學範疇，兩者雖然有所關聯，但卻不應混淆不分。

漢語聲調之物理特徵，主要取決於「音高」(pitch)之高低升降，故古人描述聲調之特點，大多借用傳統音樂術語「宮商角徵羽」五聲，而南朝文士討論聲調屬性，亦多承襲傳統以五聲為言。既是如此，為何還要另創「平上去入」四聲之新說呢？對此項疑問，陳寅恪襲取晚清改革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作為詮釋框架，認為傳統「宮商角徵

羽」用以討論音理，即所謂「中學為體」，而新創之「平上去入」乃西域輸入之實用技術，專為屬文而設，藉以創造文學韻律美感，此即所謂「西學為用」。在《元白詩箋證稿》中，陳寅恪將沈約「創立四聲」與韓愈「以古文寫小說」相類比，認為二者皆因「以古為體，以今為用」而獲致成功：

自古文人尊古卑今，是古非今之論多矣，實則對外之宣傳，未必合於其衷心之底蘊也。沈休文取當時善聲沙門之說創為四聲，而其論文則襲用自昔相傳宮商五音之說。韓退之酷喜當時俗講，以古文改寫小說，而自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此乃吾國文學史上二大事，而其運動之成功，實皆以古為體，以今為用者也。（〈新樂府〉）⁵³

陳寅恪對於上述迥異時流的發現，展現出高度自信，云：「四聲與經聲之關係，迄今千四百餘年，尚未有人略能言及。……茲特為發其覆如此，而今而後，庶幾不致『此密未覩』乎？」今日觀之，此文可謂鑿破混沌，在學術界掀起了浪潮，此後學者們開始關注四聲與佛經轉讀、永明文學之關係，吸引了音韻學家、文學家、佛學家紛紛加入討論，贊同支持者有之，反對質疑者亦夥，⁵⁴有許多問題至今仍是未了之公案。

陳寅恪大膽的「異見」是否確切可信？或許仍有待商榷，但其秉持「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信念，跳脫主流音韻學之狹隘格局，轉而從文化史視角思索問題，並吸引學者們前仆後繼進行跨領域的多元思考，此正是其學術魅力之具體展現。

（二）論籍貫、階級與身份認同（據〈東晉南朝之吳語〉）

在交際過程中，有哪些因素會影響言語行為呢？籍貫、階級與身份認同，均是可能因素。但何種最為關鍵呢？主流音韻學家依循客觀主義哲學觀，預設音韻文本多能客觀反映編撰者的實際語音，因而特別看重「籍貫」（地理位置）對語音變異所造成的影響，通常大多先入為主地假定：人們自幼習得的母語（方言），將對個人發音習慣烙下無法抹滅的

⁵³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三）》（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頁162-163。

⁵⁴ 陳寅恪〈四聲三問〉一文影響深遠，俞敏、饒宗頤、平田昌司等均曾撰文討論，表達正反意見。關於學者們爭論之諸項議題，牽涉甚廣，實非本文所能一一詳述，相關討論可參見譚世寶：〈陳寅恪的《四聲三問》論衡〉，收入胡守為主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643-665、譚潔：〈關於「四聲」與佛經轉讀關係的研究綜述〉，《河北大學學報》第34卷3期（2009年6月），頁4-8、盧盛江：〈四聲發現與佛經轉讀關係再考察〉，《社會科學戰線》第9期（2015年9月），頁131-148。

地理印記。基於此一假設，當主流音韻學家解讀音韻文本時，若發現音韻系統出現參差不齊的現象、或逸出演變常規的例外，經常歸因於編撰者之籍貫不同所致。

不同於主流音韻學家，陳寅恪從文化史立場思考問題，根據南朝史籍記載，觀察庶人、士族的不同言語行為，特別留意「社會階層」與「身份認同」所造成的影響。從語用學觀點而言，言語行為總是順應著交際之對象、目的、媒介等變數而靈活調整。在日常口語交談的情境中，東晉南朝之庶人階層慣用吳音，而士族階層則慣用北音，此即《顏氏家訓·音辭》所言：「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然而，一旦寫詩用韻，則無論庶人或士族、無論北人或吳人，均避用吳音、同用北音。何以如此？蓋因交際對象、目的有別，其所展現的「身份認同」亦隨之而異。縱使出身吳地寒門之庶人，在臨文用韻時也得附庸風雅，使用能體現高雅風格的北音，以力求躋身於上流社會階層，爭取他人的讚賞與認同。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指出庶人假冒士族的「偽雅」行為，⁵⁵並提醒主流音韻學者細心留意：

除民間謠諺之未經文人刪改潤色者以外，凡東晉南朝士大夫以及寒人之能作韻者，依其籍貫，縱屬吳人，而所作之韻語則通常不用吳音。……吳之寒人既作典雅之韻語，亦必依仿勝流，同用北音，以冒士族，則更宜力避吳音而不敢用。故今日東晉南朝士大夫及寒人所遺傳之詩文，雖篇什頗眾，**卻不能據以研究東晉南朝吳音與北音異同及韻部分合諸問題也。**⁵⁶

陳寅恪迴異時流的說法，無疑挑戰主流音韻學家的固有認知，自然料想到必會招致質疑。試想：倘若東晉南朝詩歌不能客觀反映吳地方音，那又該如何解釋不同籍貫之詩人用韻不齊的現象呢？在〈東晉南朝之吳語〉中，陳寅恪預先站在主流學者的立場思考，並且設問自答：

或問曰：信如子言，東晉南朝詩文其用韻無吳北籍貫之別，則何以同一時代，而詩文用韻間或不同？其中豈亦有因吳北籍貫之異而致參差不齊者耶？

⁵⁵ 「偽雅」(snobisme)是各民族長久以來普遍存在的現象，弗雷德里克·魯維洛瓦(Frédéric Rouvillois)說明偽雅者的心態，云：「偽雅士不是一個貴族，而是一個渴望成為貴族的人，或者是羨慕貴族派頭和特權的人，通常來說，偽雅士渴望獲得一種高於其現有地位的社會地位；他是一個僭越者，一個模仿者，還經常是一個在各方面都虛榮自負的人。」法·弗雷德里克·魯維洛瓦著，李聖雲譯：《偽雅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頁7。

⁵⁶ 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1分(1936年3月)，頁4。

應之曰：永嘉南渡之士族其北方籍貫雖有不同，然大抵操洛陽近傍之方言，似無疑義。故吳人之仿效北語亦當同是洛陽近傍之方言，如「洛生詠」即其一證也。由此推論，東晉南朝疆域之內其士大夫無論屬於北籍，抑屬吳籍，大抵操西晉末年洛陽近傍之方言，其生值同時，而用韻寬嚴互異者，既非吳音與北音之問題，亦非東晉南朝疆域內北方方言之問題，乃是作者個人審音之標準有寬有嚴，及關於當時流行之審音學說或從或違之問題也，故執此不足以難鄙說。⁵⁷

對於各地詩人用韻不齊的現象，陳寅恪認為並非反映實際方音之差異，而是源自於個人審音標準之或寬或嚴、對於審音學說之或依或違，乃是受個人主觀因素影響所致，體現個人對韻部劃分與音理闡釋之獨特認知。換言之，不同籍貫詩人用韻分合之現象，或許難以施用於方音史之研究，但卻是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

（三）論《切韻》性質與音系基礎（據〈從史實論切韻〉）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選擇陸法言《切韻》作為建構漢語語音史的關鍵文獻。高本漢以中古《切韻》音系為基礎，向上推溯上古音韻系統，向下則與現代漢語方言相對應，從而建構出漢語語音史的歷時演變脈絡。由此可見，《切韻》在語音史上的地位猶如中流砥柱，一旦有所鬆動，將對高本漢的語音史典範帶來巨大的挑戰。

《切韻》音系性質為何？無疑是「語音史」研究首先必須確認的問題。然而，迄今為止，這個關鍵問題仍是爭論不休，學者之間仍然存在著對立的意見。⁵⁸依高本漢的看法，《切韻》反映一時一地之音（七世紀的長安音），但此種單一音系的想法，顯然與陸法言〈切韻序〉所云：「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之編撰理念不符，已受到現代音韻學者的質疑；儘管如此，但高本漢的觀點並未因此被徹底拋棄，而是改頭換面，以一種非驢非馬的混沌形態繼續存在。對此，潘文國以〈漢語音韻研究中難以迴避的爭論〉（2002）為題，提出四項無可逃避的問題：

1. 《切韻》是單一音系？還是綜合音系？
2. 若《切韻》兼容古今南北，是如何將多種體系綜合在一起？
3. 《切韻》與早期韻圖的關係為何？

⁵⁷ 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頁4。

⁵⁸ 《切韻》音系的性質為何？歷來存在各種不同說法。李海英區分各家學說之異同，先分成「口語音」、「讀書音」兩大類，再細分「單一論」、「吸收論」、「綜合論」三次類，共計分成六類。李海英：〈《切韻》性質研究綜論〉，《魯東大學學報》第5期（2014年5月），頁57-63。

4. 《切韻》若是綜合音系，能否構擬音值？該如何構擬？

其中問題 4，無疑直接戳中了高本漢學說之軟肋，足以撼動其立論基礎。⁵⁹對「語音史」研究者而言，潘文國（2002）的文章猶如震撼彈，激發漢語音韻者對《切韻》性質之重新檢視，掀起了一波討論熱潮。但直至今日，學者對《切韻》性質仍聚訟紛紜、嘵嘵不休。如何才能釐清《切韻》音系之爭端呢？或許解謎關鍵就在於變換視角、擴大視域，盡可能回歸古人的生活情境，設身處地站在古人的立場思考，進而深入追問：為何《切韻》肇始於隋代開皇年間？為何參與審音者是劉臻等八人，而非其他人？為何審音過程是「蕭、顏多所決定」呢？為何《切韻》撰成後，陸法言謙稱「直欲不出戶庭」？……等文本外圍問題。

早在八十餘年前，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一文，已展現迴異時流、不逐隊隨人之創新，嘗試走出「語音史」的狹隘格局，轉而從制度史、文化史的角度論述東晉南朝士族階層的「雅言觀」，進而對《切韻》性質做出新的詮釋。若以學術史的眼光評價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個人以為該文有以下幾項貢獻：

1. 釐清語音的功能變體

語言是具適應性的複雜系統，在現實交際環境中，說話者為求得體合宜、切合身份，必須順應交際環境之變化而靈活調整語言形式，從而形成不同的功能變體。以文字書寫為例，有篆書、楷書、行書等不同書寫形式，各自擔負著不同交際功能：刻印題匾時，可選用篆書，營造古典高雅的風格；書寫正式文件，多用楷書，顯得工整而清晰；私人紀錄，則多用行書，以求迅速流暢。同樣道理，語音亦有其功能變體，以「白」字音讀為例，在現今台灣的社會語言環境中，僅就個人親身之經歷而言，經常可聽見四種讀音：[pai¹]（國語白讀）、[po¹]（國語文讀）、[pe²]（閩南話白讀）、[pik]（閩南語文讀音），各有其適用情境與交際功能。由此可知，東晉南朝之士族階層亦有其不同語音變體，在討論《切韻》性質之前，必須仔細釐清不同的語音變體。

⁵⁹ 潘文國對「語音史」研究者發出警示，指出：「如果綜合音系確實能夠成立的話，按照合理的邏輯推理，在客觀上就勢必推翻高本漢體系的整座大廈。高本漢體系已經慘淡經營了半個多世紀，在國際國內都有著不可估量的廣泛影響，甚至已成了『現代漢語音韻學』的標誌。同許多人一樣，這並不是我們願意看見的結果。」潘文國：〈漢語音韻研究中難以迴避的論爭——再論高本漢體系及《切韻》性質諸問題〉，《古漢語研究》第4期（2002年12月），頁9。

隋代初年，士族階層的言語行為存在哪些語音變體？如何區分雅、俗？判斷風格差異的標準為何？根據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的剖析，東晉時期至少存在著四種不同的語音變體，⁶⁰依照由「雅」到「俗」的程度排列，其次序為：

- A. 洛生詠—東晉以前，洛陽太學生誦讀經典之雅音
- B. 南音—東晉金陵士族階層讀書音
- C. 北音—東晉洛陽士庶階層讀書音
- D. 吳音—東晉金陵庶人階層口語音

上述四種不同語音變體之間，有何差別？有何關連？若分別從「情境」、「時代」、「地域」、「親緣」的角度著眼，可窺見語音變體之間的各種交互關係：

- 依「情境」區分：A、B、C 三者為讀書音，D 則為口語音。
- 依「時代」區分：A 的時代最為古老，為西晉以前之洛陽舊音，只殘存在豪門貴族的家庭教育中，為貴族階層所獨有之文化資本，堪為上流人士身份地位之表徵。
- 依「地域」區分：A、C 為北方語音，B、D 為南方語音。
- 依「親緣」區分：A、B、C 三者同出一源、關係親近；A 為源頭，派生出 B、C 二個分支，其中 A 與 B 的親緣關係較近。⁶¹

蕭該、顏之推等人「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又以哪項條件作為主要的審音標準呢？如同陸法言〈切韻序〉所言：「凡有文藻，即須明聲韻」，《切韻》一書乃為創作詩文之需求而編，故就上述四種語音變體而言，自然是以 A（東漢洛陽舊音）為理想之審音標準。關於「洛陽舊音」之性質，陳寅恪進一步解釋：

大抵吾國士人，其平日談論所用之言語，與誦習經典諷詠詩什所操之音聲，似不能完全符合。易言之，即談論唯用當時之音，而諷誦則常存古昔之讀是也，依此，南方士族，其談論乃用舊日洛陽通行之語言，其諷誦則準舊日洛陽太學之音讀。考東漢之時，太學最盛，且學術文化，亦有綜合凝定之趨勢。頗疑當時太學之音聲，已為一美備之複合體，此複合體即以洛陽京畿之音為主，且綜合諸家師授，兼採納各

⁶⁰ 本文將相同概念意義之不同語音形式稱為「語音變體」，此乃是從社會語言學角度而言。何大安稱之為「層次」，則是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觀察。何大安：〈六朝吳語的層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4 本第 4 分（1993 年 12 月），頁 872。

⁶¹ 顏之推云：「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97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173。案：永嘉之亂後，北方豪門高官隨晉室南渡，將洛陽舊音亦保留在江左，故南方士族之語音較北方士族更為純正。

地方音而成者也。……故本文“洛陽舊音”一詞，不僅謂昔日洛陽通行之語音，亦兼指謝安以前洛生詠之音讀。特綜集各地方音以成此複合體之新音者，非陸法言及顏、蕭諸賢，而是數百年前之太學博士耳。⁶²

「洛陽舊音」是個外延模糊的概念，據陳寅恪推測，可能是由洛陽京畿舊音、經師講授之讀音、各地方音混雜而成的「美備複合體」。再者，時過境遷，數百年前之洛陽舊音已難恢復、鮮人通曉。隋朝統一南北分治局面後，若想要編撰一本韻書，作為天下文士作詩用韻共同依循的語音標準，面對當時之境況，審音者只得退而求其次，以 B 為基礎，以 C 為參照，並且盡可能去除 D 之干擾，從而創造出超越現實方言之上的理想化音系。⁶³因此，能夠擔負審音任務者，必然得通曉 B、C，並且對 A、D 有識別能力之正音士族，其中主導者蕭該、顏之推二人為南朝之僑姓高門，參證者盧思道、李若、辛德源、薛道衡、魏澹等人則是北朝正音世家，⁶⁴參與《切韻》審音之人莫不語音切正，咸以文學聞名，故魏彥淵敢勇於自信向陸法言說道：「我輩數人，定則定矣」。

2. 證偽高本漢之學說

高本漢《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我們用『中古漢語』（Ancient Chinese）指代《切韻》纂集的公元 600 年左右的語言，這實質上就是陝西長安方言。這一方言在唐朝成為一種共通語（Koine），除沿海的福建省以外，全國各州縣的知識界人士都說這種語言」⁶⁵高本漢認為《切韻》是七世紀長安音，是唐代通用天下的共同語，此一論斷乃是以西方眼光詮釋中國傳統韻學文本，顯然欠缺「了解之同情」，有違歷史事實。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一文，羅列諸項證據以駁斥高本漢學說，消極證據有三：1.從《切韻·序》可知此書是基於劉臻等八人之審音結果，並參考古今字書而寫定，非當時某地行用之方音。2.陸法言編撰《切韻》所用之主要材料，全無關中人士之著作。3.決定審音原則之諸賢，全無關、隴人士。另外，陳寅恪又提出兩項積極證據：1.《切韻·序》談及各地方言之失，獨不見

⁶²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366。

⁶³ 朱曉農對闡述對《切韻》性質的看法，指出：「《切韻》『具有異質音素』，意思是有一個音系作為底本，加上些其他來源的音素。……『具有語音基礎』，但不代表某個活音系。也就是說，每個字都念得出，卻不是任何人的母語，甚至不是任何地方的書音系統。這是一個理想系統。」朱曉農：《方法：語言學的靈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89。本文對於《切韻》性質的看法，與朱曉農一致。

⁶⁴ 史睿指出：「參與撰定《切韻》的北朝學士，不難發現有兩方面的共同特徵：其一是各家均通達音韻之學，其一是各家均與南北交聘有關，他們或者本人曾任聘使，或者家族中曾有人擔當聘使。」史睿：〈北朝士族音韻之學與南北交聘〉，《文史》第 4 輯（2016 年 11 月），頁 61。

⁶⁵ 瑞典·高本漢著，聶鴻音譯：《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濟南：齊魯書社，1987 年），頁 2。

中原一區，可知中原（即洛陽近傍之音）乃諸賢心中之正音。2.由「蕭、顏多所決定」，可知南方士族語音比較接近正音。陳寅恪總結上述五項證據，對高本漢的說法予以證偽，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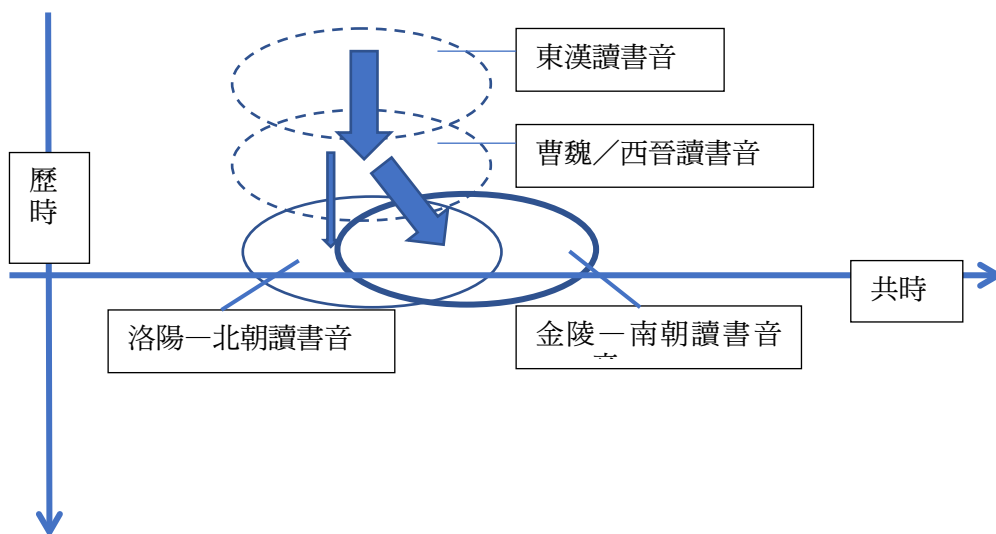
陸法言之寫定《切韻》，其主要取材之韻書，乃關東江左名流之著作。其決定原則之群賢，乃關東江左儒學文藝之人士。夫高齊鄴都之文物人才，實承自太和遷都以後之洛陽，而東晉、南朝金陵之衣冠禮樂，亦源自永嘉南渡以前之京邑（即洛陽），是切韻之語音系統，乃特與洛陽及其附近之地域有關，自易推見矣。又南方士族所操之音聲，最為接近洛陽之舊音；而切韻一書所遵用之原則，又多所取決於南方士族之顏、蕭。然則自史實言之，切韻所懸之標準音，乃東晉南渡以前，洛陽京畿舊音之系統，而非陽隋開皇、仁壽之世長安都城行用之方言也。⁶⁶

正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縱使高本漢所主張「《切韻》反映單一音系說」已被陳寅恪所證偽，但直至今日，高本漢的「語音史」典範仍然維持著主流的地位，音韻學者們依然為「《切韻》性質為何？」這問題而時有爭論。

3. 以縱向眼光追溯雅音發展脈絡

當代主流音韻學者依循高本漢「語音史」路徑，大多從「共時」層面著眼，以橫切角度詮釋文本，故將《切韻》音系定位為一時一地語音，亟欲尋找某個實際方言點作為《切韻》之基礎音系，如此方能著手擬構音值。然則，陳寅恪採取文化史路徑，故從「歷時」層面著眼，以縱貫角度詮釋文本，認為《切韻》音系並非一時一地之現實音系，而是由歷代士族階層的雅音逐漸遞演、層層積澱而成，其源頭可上溯至東漢洛陽太學生之讀書音。共時、歷時觀點之差異，即如下圖所示：

⁶⁶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頁364。



由於《切韻》是陸法言依據群賢遺意，並參考古今字書而撰定，文中蘊含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語音材料，是人為的理想化音系，絕非一時一地之方音實錄。高本漢堅持《切韻》為單一音系說，暴露出西方漢學家欠缺史學通識之弊病。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1930）中，陳寅恪對於今人欠缺史學之通識而導致詮釋謬誤提出批評：

中國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諸子等經典，皆非一時代一作者之產物。昔人籠統認為一人一時之作，其誤固不俟論。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時之所作，而不知以縱貫之眼光，視為一種學術之叢書，或一宗傳燈之語錄，而斷斷致辯於橫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學之通識所致。⁶⁷

總結上述，陳寅恪從文化史角度詮釋音韻現象，不跟隨著主流的語音史典範，展現「迴異時流」的獨立精神。雖然陳寅恪提出的觀點，不乏主觀臆測、尚待商榷之處，例如：四聲是否來自佛經轉讀，是否溯源至天竺圍陀聲明論？東漢太學生雅音是否為美備複合體？等等。無論如何，陳寅恪不囿於常規的奇思妙想，體現出「**新而不怪，奇而不邪**」的創見，比起循規蹈矩、平淡庸常的定見更具啟發性，更具有吸引後學投入的學術魅力。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寫到：「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

⁶⁷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248。

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⁶⁸如今看來，若以這段話來評價陳寅恪的音韻學成就，應該也是頗為恰當的。

四、結語

杜甫〈戲為六絕句之二〉：「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以學術發展史的眼光觀看，某些曾經引領風騷、風靡一世的學說，當下或許受到學人爭相追隨，如今卻已成為明日黃花；相對的，某些曾被主流群體輕忽蔑視的奇異觀點，時過境遷後，卻反倒能拂去塵埃、熠熠生輝，散發出獨特而睿智鋒芒。陳寅恪的音韻學研究，正是在其學術思想土壤上所開的奇葩，有別於高本漢「語音史」之科學化模式，洋溢著獨特的人文魅力。

近百年來，漢語音韻學沈浸西方中心論的慣性思維中，音韻學者往往以西方眼光看待中國韻學文本，忽略了應以「了解之同情」，設身處地去理解作者的主觀意圖與思想背景，致使音韻學研究逐漸失去人文主體性。陳寅恪以文化史視域梳理歷史文本、解釋音韻現象，融合考據實證（漢學）與義理闡釋（宋學），不啻為自立於舊派、新派之外的一股異流，在當前主流音韻學日漸疲弊之際，對於音韻學未來之開展特別具有啟發作用，值得我們以開放的態度重新予以關注。

⁶⁸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18。

徵引文獻

古籍

- 北齊·顏之推 YAN, ZHI-TUI: 《顏氏家訓》*Yan Shi Jia Xun* 收入《叢書集成初編》*Cong Shu Ji Cheng Chu Bian* 第 973 冊（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年）。
- 清·段玉裁 DUAN, YU-CAI: 《六書音均表》*Liu Shu Yin Yun Biao*, 收入《說文解字注》*Shuo Wen Jie Zi Zhu*（臺北 Taipei: 天工書局 Tiangong Book Company, 1987 年）。
- 清·陳澧 CHEN, LI 撰，羅偉豪 LUO, WEI-HAO 點校: 《切韻考》*Qie Yun Kao*（廣州 Guangzhou: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4 年）。
- 日·空海 KONG-HAI: 《文鏡秘府論》*Wen Jin Mi Fu Lun*（臺北 Taipei: 河洛圖書出版社 He Luo Book Company, 1976 年）。

近人論著

- 王國維 WANG, GUO-WEI: 〈五聲論〉“Wu Sheng Lun”，《定本觀堂集林》*Ding Ben Guan Tang Ji Lin* 上冊（臺北 Taipei: 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 1991 年），卷 6，頁 341-349。
- 王震邦 WANG, ZHEN-BANG: 《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Independent and Freedom: Chen Yin Que Lun Xue”（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11 年）。
- 史睿 SHI, RUI: 〈北朝土族音韻之學與南北交聘〉“Phonology of Bei Chao Shi Zu i Xue and Nan Bei Jiao Ping”，《文史》*Wen Shi* 2016 年第 4 輯（2016 年 11 月），頁 53-68。
- 平田昌司 Shoji Hirata: 〈讀陳寅恪《四聲三問》〉“Read Chen Yin Que ‘Si Sheng San Wen’”，《學人》*Xue Ren* 第 10 輯（1996 年 9 月），頁 197-217。
- 朱曉農 ZHU, XIAO-NUNG: 《方法：語言學的靈魂》*Method: Soul of Linguistics*（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年 5 月）。
- 何大安 HO, DA-AN: 〈六朝吳語的層次〉“Levels of Liu Chao Wu Dialect”，《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第 64 本第 4 分（1993 年 12 月），頁 867-875。
DOI: 10.6355/BIHPAS.199312.0867。
- 余英時 YU, YIN-SHI: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Chen Yinque Wan Nian Shi Wen Shi Zheng*（臺北 Taipei: 東大圖書公司 Dong Da Book Company, 2019 年）。
- 李海英 LI, HAI-YIN: 〈《切韻》性質研究綜論〉“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 of Qie Yun”，

- 《魯東大學學報》*Journal of Ludong University* 第 5 期（2014 年 5 月），頁 57-63。
- 李葆嘉 LI, BAO-JIA：〈西洋漢語文法學三百年鳥瞰〉“A bird's-eye view of the three hundred years of Western Chinese grammar”，《華東師範大學學報》*Journal of Huadong Normal University* 第 3 期（2020 年 5 月），頁 1-24。
- 沈衛榮 SHEN, WEI-RONG：《回歸語文學》*Return to Philology*（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9 年）。
- 林燕 LIN, YAN：〈陳寅恪的語言思想研究〉“Chen Yinque's Research on Linguistic Thought”，《西南交通大學學報》*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第 17 卷 5 期（2016 年 9 月），頁 55-62。
- 林遠澤 LIN, YUAN-ZE：《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From Herder to Mead: The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 towards Communicative Communities*（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公司 Lianjing Publishing Co.，2019 年）。
- 姚小平 YAO, XIAO-PING：《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語言研究》*Wilhelm von Humboldt: Humanities Studies and Language Studies*（北京 Beijing：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5 年）。
- 胡頌平 HU, SONG-PING：《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補編》*Hu Shi Zhi Xian Sheng Nian Pu Chang Bian Chu Gao-Bu Bian*（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公司 Lianjing Publishing Co，2015 年）。
- 許世瑛 XU, SHI-YING：〈敬悼陳寅恪老師〉“Condolences to Teacher Chen Yinque”，《談陳寅恪》*On Chen Yinque*（臺北 Taipei：傳記文學出版社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Press，1970 年），頁 43-48。
- 陳弱水 CHEN, RUO-SHUI：〈現代中國史學史上的陳寅恪——歷史解釋及相關問題〉“Chen Yinqu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Related Issues”，《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Reflection of Academic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Seventy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 Academia Sinica，2000 年），頁 27-65。
- 陳寅恪 CHEN, YIN-QUE：〈東晉南朝之吳語〉“Wu Dialect in Dong Jin Nan Bei Dynasty”（1936），《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第 7 本第 1 分（1936 年 3 月），頁 1-4。DOI：10.6355/BIHPAS.193601.0009。
- 陳寅恪 CHEN, YIN-QUE：《寒柳堂集》*Han Lou Tang Ji*，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一）》*Anthology of Chen Yinque*（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e Jin BKS，1980 年）。
- 陳寅恪 CHEN, YIN-QUE：《金明館叢稿二編》，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二）》*Anthology of Chen Yinque*（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e Jin BKS，1981 年）。

陳寅恪 CHEN, YIN-QUE:《金明館叢稿初編》*Jin Ming Guan Cong Gao Cu Bian*《陳寅恪先生文集（一）》*Anthology of Chen Yinque*（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e Jin BKS，1981 年）。

陳寅恪 CHEN, YIN-QUE:《元白詩箋證稿》*Yuan Bai Shu Jian Zheng Gao*（1950），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三）》*Anthology of Chen Yinque*（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e Jin BKS，1982 年）。

陳寅恪 CHEN, YIN-QUE:《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出版社 Sanlan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2015 年）。

陳懷宇 CHEN, HAI -YU:《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Found Chen Yinque in the West: The Background of Oriental and Western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Humanities*（北京 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2013 年）。

傅斯年：FU, SI-NIAN〈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The purpose of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第 1 本第 1 分（1928 年 10 月），頁 3-10。DOI：10.6355/BIHPAS.196701.0003。

傅璇琮：FU, XUAN-CONG〈一種文化史的批評——兼談陳寅恪的古典文學研究〉“A Criticism of Cultural History: On Chen Yinque's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中國文化》*Zhong Guo Wen Hua* 第 1 期（1989 年 2 月），頁 75-83。

童慶生 TONG, QIN-SHENG:《漢語的意義——語文學、世界文學和西方漢語觀》*Chinese meaning :Philology, World Literature and Western Views on Chinese*（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出版社 Sanlan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2019 年）。

楊焄 YANG, XUN:〈許世瑛與陳寅恪：文章背後的學緣〉“Xu Shi Ying and Chen Yin Que: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behind the article”，《卻顧所來徑》*Que Gu Suo Lai Jing*（北京 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2018 年），頁 138-146。

趙元任 ZHAO, YUAN-REN:《從家鄉到美國——趙元任早年回憶》*From home to America: Zhao Yuanren's Early Memories*（上海 Shanghai：學林出版社，1997 年）。

潘文國 PAN, WEN-GUO:〈漢語音韻研究中難以迴避的論爭——再論高本漢體系及《切韻》性質諸問題〉“The Inescapable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honology: On the Bernhard Karlgren's System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Character of Qieyun”，《古漢語研究》*Ancient Chinese Studies* 第 4 期（2002 年 12 月），頁 2-12。

蔣天樞 JIANG, TIAN-SHU:《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Chen Yin Que Xian Sheng Bian Nian Shi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盧盛江 LU,SHENG-JIANG:〈四聲發現與佛經轉讀關係再考察〉“Re-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covery of Four Tone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社會科學戰線》*She Hui Ke Xue Zhan Xian* 第 9 期（2015 年 9 月），頁 131-148。

- 蕭伊緋 XIAO, YI-FEI：〈陳寅恪“對對子”試題爭議始末——以北平《世界日報》相關報導為中心〉“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Chen Yin Que‘ Dui Dui Zi’ Test Question Controversy：Focusing on reports related to Peiping’s “Shi Jie Ri Bao”,《關東學刊》*Guan Dong Xue Kan* 2017 年第 5 期(2017 年 5 月)，頁 116-141。
- 羅常培 LUO, CHANG-PEI：《漢語音韻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honology* (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e Jin BKS，1982 年)。
- 譚潔 TAN, JIE：〈關於「四聲」與佛經轉讀關係的研究綜述〉“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covery of Four Tone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河北大學學報》*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第 34 卷 3 期(2009 年 6 月)，頁 4-8。
- 譚世寶 TAN, SHI-BAO：〈陳寅恪的《四聲三問》論衡〉“Chien Yin Que de‘ Si Sheng San Wen’ Lun Heng”，收入胡守為 HU, SHOU-WEI 主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Chen Yinque and Chinese Academics in the 20th Century* (杭州 Hangzhou：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0 年)，頁 643-665。
- 顧明棟 GU, MING-DONG：《漢學主義——東方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2015 年)。
- 法·弗雷德里克·魯維洛瓦 Frédéric Rouvillois 著，李聖雲 LI, SHENG-YUN 譯：《偽雅史》*Historie du Snobisme* (上海 Shanghai：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2011 年)。
- 瑞典·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著，聶鴻音 NIE, HONG-YIN 譯：《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Shandong Qilu Press Co, Ltd.，1987 年)。
- 瑞典·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著，趙元任 ZHAO, YUAN-REN、羅常培 LUO, CHANG- PEI、李方桂 LI, FANG-GUI 合譯：《中國音韻學研究》*Research on Chinese Phonology* (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95 年)。
- 德·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著，姚小平 YAO, XIAO-PING 譯注：《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長沙 Changsha：湖南教育出版社 Hunan Education Press，2001 年)。

The Singular Way from the Tradition: Exploring Chen Yinque's Research on Chinese Phonology from Academic Concepts and Interpretation Methods

WANG, SONG-MU

(Received July 5, 2022 ; Accepted October 13, 2022)

Abstract

Though best known as a historian, Chen Yinque was an erudite scholar in many fields. For example, in his early period of studying abroad, he 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German classical philology, as indicated in his “Sisheng Sanwen” (1934), “On Wu Chinese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1936), “On *Qieyun* from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1949).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mentioned in these articles ha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of Chinese phonology. H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hen's research on Chinese phonology by analyzing (i) his genealogy of scholarship, (ii) research methods, and (iii) his influences and inspirations, and finally elaborates his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ities that his phonological systems exhibits—which stands in contrast to Bernhard Karlgren's model of history of phonology. Therefore, the paper wishes to open up a new category of scholarship that mends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former scholarship in this field in order to exhibit the rules for future scholars. The researcher wishes that it would serve as an example of shift for the future Chinese phonology scholarship.

Keywords: Chen Yinque, philology, phonology, history of culture, *Geyi*

